



“木匠皇帝” 明 熹 宗

常 慧 ◎ 主编

乱世君王

(下)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江 娜

名家藏书·乱世君王
“木匠皇帝”明熹宗(下)

编 著 者	常 慧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修订第 2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	45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660-X/I·262
总 定 价	960.00 元
本册定价	12.5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在世纪更替，风云变幻之际，中国封建王朝走向了灭亡，与之相伴随的皇帝也成为了历史。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也就是皇帝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皇帝曾经煊赫两千余年。上起始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下迄末代皇帝溥仪。社会是进步的，皇帝终于被历史的烟云所湮埋。

本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对历朝历代皇帝及皇后进行了描述，有胸怀壮志的开国之君；有治国有方的盛世之君；还有居于乱世，有心治国而回天乏力的乱世之君，最后却在一帮伶臣的包围下沦为一个昏君；更有命运悲惨，身首异处的末代君王。苏轼曾做过一首词，其中有两句“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后世常拿“高处不胜寒”来形容皇帝的处境，既贴切，又含蓄。这是深通人情、对居高位者的匠心写照，又是身入孤绝之境的无奈何的喟叹，

凡为了追猎高位有做皇帝心愿的人在愿望目的达到之后,都免不了“高处不胜寒”的境地,如果以忤刻的心理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则所得到者恐非一个“寒”字了得,所谓不诚无物,则皇帝的遭遇犹如水中之花、镜中之月而已。幸与不幸,可质诸心而不可质诸纷繁之表面。

本书遵于历史,而又用艺术的手法,集知识与趣味于一体。内容充实,改变了以往历史题材书籍的生硬。适于广大中小学生阅读。

编 者

第四章 频兴大狱

一、忠臣的抗争

从根本上说，宦官专权是皇权高度发达造成的一个特殊结果。只有当君主独裁的猛兽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它身上的寄生虫才能那样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宦官专权又是皇权自身的一种异化，那些从皇权中派生出来的权力有时候会自行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程度，甚至会大大损害了皇权本身。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唐代中叶以后，那时的宦官集团不但把持了朝政，而且能够随意废立、生死君主。自唐宪宗以后的十个皇帝中，有七个为宦官所拥立，其中宪宗、敬宗、文宗三个皇帝都是死于宦官之手。皇帝真成了宦官手上一件不值钱的傀儡。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后代君主们对使用宦官多少产生了一些顾忌，有些皇帝还公开宣布过：严

禁宦官参与政治。

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曾多次提出不能信用宦官：“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为宦官制定了许多限制条令：严禁内臣干预朝政，禁止内臣同外官文移往来，甚至禁止内官读书识字。他还命在宫中竖立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期望子子孙孙不要失去警惕。

从来以“法祖宗”自我标榜的明朝各代皇帝们，对于太祖皇帝的这一条祖训却执行得十分差劲。内臣不但干预了政事，而且还要总揽朝纲，堂而皇之地充当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在这种时候，只有那些赤胆忠心的骨鲠之臣才会对照祖训而痛心疾首，才会做出软弱无力的抗争。魏忠贤走上政治舞台之后，也遇到了这样的抗争，那些骨鲠之辈则差不多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自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专权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东林党人的失败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他们的僵化教条，不能审时度势，缺乏灵活的政治斗争艺术。但归根到底，他们的失败还是形势使之然。一方面，忠臣的地位与忠臣的行为模式使他们注定了要在同魏忠贤的斗争中占下风；另一方面，积年的朋党之争也给东林党人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东林党人大失败后，朝中的局面大为改观了，一切重要岗位都换上了魏忠贤的坚决拥护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东林党人的讨魏斗争反倒促成了魏忠贤的专权。

天启的最初几年，仍然是东林党人在朝廷中极其昌盛的时期。天启二年，他们成功地排挤掉内阁中惟一的异己分子沈洁。在此前后，他们还不失时机的重新提起“挺击”、“红丸”和“移宫”三件历史旧案，决心把那些在“三案”中同东林唱反调的人在舆论上搞臭。

天启三年春天，正值京察大典，主持者吏部尚书张问达和左都御史赵南星都是东林中巨擘，于是把原先专同东林作对的所谓“邪党”人物纷纷贬黜外放。这次京察实际上成了一次东林党排除异己的宗派主义活动。“邪党”大量被清洗，东林党人占据了几乎一切要冲，按照《明史》上的说法，这个时期是“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起初，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敌意。他也很清楚，全靠天启帝的信任，他才能拥有那样了不起的权势，而天启帝父子能稳稳当当地继承皇位，又多亏东林党人奋斗不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东林于魏忠贤也算有恩。更何况，作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他需要在朝中势力浩大的东林党人的合作，需要他们的才干和经验。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魏忠贤对于东林集团相当客气。天启二年十一月，赵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忠贤就曾派其外甥傅应星带着礼物前去拜贺。只不过那一次吃了闭门羹，因为东林党人根本不想领这个情。

对于公然践踏祖宗法度，干预政务，甚至以皇帝代表自居的魏忠贤，东林党人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敌视、仇恨。从天启元年起，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势，目标就是要削弱魏忠贤，打倒魏忠贤。

下面是东林党人同魏忠贤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几次事件：

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御史周宗建为客氏出宫复入事抗疏极谏。给事中侯震暘、倪思辉，朱钦相，御史王心一、马鸣起，侍郎陈邦瞻等相继疏谏。

周宗建，南直吴江(今江苏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初任知县，因有异政入选御史。在东林党人中，周宗建是最敢讲话的人之一。客氏出宫后只在外面过了两个晚上就再度回宫，第二天，周宗建首先提出了抗议，认为“两日之间，乍出乍入，天

子成言，有同儿戏”，实在大不应该，而且客氏这种无知妇人溺于深宫，也很可能造成祸害。紧接着，侯震旻的本章用了更加严厉的语言。周宗建和侯震旻因之受到皇帝的斥责，但没有遭到惩治。接下来，马鸣起、倪思辉等人仍然不断地抗议此事，于是被处以罚俸或是贬官外调。朝臣们坚持了几个月，但皇帝绝不让步，东林党人最后只好接受既成事实，由着客氏居住在宫中。这次较量，皇帝取得了胜利，或者说，魏忠贤取得了胜利。

东林党人在论客氏出宫的时候，并没有提名道姓地带上魏忠贤。但他们的意之所指却是明确的。侯震旻疏中说：“宫闱禁近之地，诟宜习熟往来，……况中涓群小，内外锁连，借丛煬灶，有可忍言者。”中涓即指宦官，主要矛头就是对着魏忠贤。他们还在奏疏中反复引用东汉时期的史事，提到安帝的乳母王圣，顺帝的乳母宋娥，灵帝的乳母赵娆。这些历史上的乳母个个都与宦官狼狈为奸，搅得宫中不宁、朝中不宁。其中又以赵娆的事迹最为触目惊心。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她伙同中常侍曹节等大宦官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杀了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篡夺了大权。宦官集团紧接着大兴党锢，把那些不满宦官专权的“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诛戮禁锢，使官僚士大夫蒙受了一场无情浩劫。历史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汉灵帝时期的政治局势同天启后期的局势相比，就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东林党人反复引用党锢之典或许是有着了对悲惨未来的某种预感。在驱逐客氏的活动中，东林党人对宫中情势显然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没有魏忠贤，客氏不会给朝廷造成什么危害；而没有客氏，魏忠贤也难成气候。所以他们才会利用皇帝许下的诺言，在魏忠贤根子还没扎深，地位还不巩固的时候发动一场侧面进攻，实在是用心良苦。可惜少年天子惯会食言，忠臣们的良苦用心成了泡影。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给事中惠世扬、侯震旻,御史江秉谦等劾大学士沈洁交通阉人,弄兵大内。侯震旻等疏并直指魏忠贤。

三月初,魏忠贤在宫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的阉人武装部队,并在西苑进行操练,这引起了朝臣们极大的不安。以太监成军,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和万历时期都有过先例,与其说是为了国防,还不如说是为了给皇帝增添一个娱乐项目。但前几次阉人武装都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祖宗的法度,况且大内兴兵也不是国家吉祥之兆,朝臣们通常反对得很厉害。这一次组织阉军,据说是得到沈洁赞同的,而沈洁从来被东林目为“邪党”人物,所以东林党人正好把罪责推到宿敌的身上。自三月起直至七月,攻讦沈洁的奏章接连不断,沈洁也终于不得已请求退职。在这个战役中,东林党人似乎取胜了,只是他们坚决反对的内操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沈洁被攻击的主要罪行之一是交通阉人,这当然又同魏忠贤有关。不过这一次东林内部似乎分成了温和的和激烈的两派。一派如惠世扬等联名弹劾沈洁交通内监,但举出的姓名却多是些无关痛痒的人物。另一派是在驱客活动中就十分积极的侯震旻和周宗建等人,他们直指魏忠贤。周宗建在五月的一份奏疏中公然说魏忠贤“目既不解一丁,心复不谙大义。……侧耳目设笑之暇,日与相亲,宫庭礼法之事,渐觉其苦。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这种强硬的敌对态度逼着魏忠贤只好决裂了。

天启二年十月,新科状元文震孟上《勤政讲学疏》。

《勤政讲学疏》的内容是敦促皇帝切实负起责任,亲自执掌国政。这位新状元胆子很大,在谈到皇帝参加那些例行的朝拜仪式时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

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个说法恰恰道出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实质：天启帝只是一具傀儡。至于谁是傀儡后面的提线操纵者，文震孟并没有说明，但魏忠贤似乎很了解疏中的真意。他以皇帝的名义传出圣旨，要对胆敢侮辱君主文震孟廷杖八十。由于朝臣们的救护，文震孟后来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但魏忠贤以此第一次对东林党人露出了狰狞面目。双方的对立更加尖锐。

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周宗建疏攻给事中郭巩交结魏忠贤，并把魏忠贤比作前朝的汪直和刘瑾。

周宗建同郭巩的矛盾是由其他一些事情引起的，但至少按照周宗建的说法，郭巩数次攻击东林党人是因为受了魏忠贤的指使。周宗建认为，帝国现在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魏忠贤不仅握有大权，而且内有客氏为援，外有郭巩一类小人帮衬，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前朝的刘瑾。他还特别请求皇帝调查王安惨死的原因。据说魏忠贤对周宗建之疏反应很强烈，还在皇帝面前大哭大闹过一番。他本拟对周宗建实行廷杖，由于大臣的争执，最后仍是罚俸了事。

在周宗建以后，又有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胡良机、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但魏忠贤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相反，在同东林党人的决裂已经无法转逆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魏忠贤还适度地展开了反击。利用朝中一些人同东林党人的矛盾，魏忠贤从重要岗位上排挤走了东林主将刘一燝、邹元标等人。这样屡屡进攻而全无收效，大概颇使东林党人恼火，促使他们在天启四年对魏忠贤发起了一场总攻。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大将、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行，并要求将他“面缚至九庙之前，集大小文武勋戚，敕法司逐款严讯，……正法以快神

人公愤。”在东林党人指斥魏忠贤的奏疏中，杨涟疏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因而也最有代表性。从疏中的言辞不难看出东林党人对当时政治情势的判断和他们的一些真情实感。

这份文件相当长，二十四行大罪罗列的事实也很多，但其中要害的要害就是一句话：擅天子之权。

杨涟在疏中劈头就指出：“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且使其一力担当，责无他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在第二章中我们讲过，票拟是内阁的特权。如果皇帝对某事自有主见，派人向内阁传达口头或书面信息，要求内阁照其意拟旨，就称为“传奉”，这已经有点侵内阁之权的意味了。如果皇帝根本不通过内阁，直接在本章上拟旨（当然要通过司礼监），则称“内批”。由于内批完全违背明代的政治制度，可以认为是非法的。但在极权社会中，皇帝的意志具有绝对高于一切的性质，所以无论他有什么想法，也不论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想法，臣民都只能遵行。只是在东林党人看来，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君臣间极度隔离的状态下，外朝诸臣根本就弄不清这些传奉和内批到底是皇帝的本意还是出自别的什么人之手，所谓“谁为辨之”。不过按照杨涟全疏的逻辑，至少他本人并非莫辨真假，而是确信所有这些传奉与内批来的旨意全是魏忠贤的私货。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把朝廷中种种劣政的责任都安在魏忠贤的头上。

杨涟并没有分析魏忠贤何以能够擅天子之权，但他却明确地点出了这种状况的实质：“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中贤专擅，即奉奏之旨，反觉皇上为名，中贤为实。”魏忠贤正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以皇帝政治代表的身分统治着这个帝国。

在天子的名义下，魏忠贤肆意地践踏传统和制度。明代任命高级官员通常由有关方面协商推荐，称为“会推”。会推出的名单通常是一缺数人，由皇帝最后指定一人；但根据常规，皇帝应该选择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人。杨涟指出，在会推内阁成员和尚书、侍郎的时候，魏忠贤竟然违反历来的规矩，不用名单首列的第一人。据杨涟分析，这是“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本身就包藏着极大的祸心。

杨涟还列举了在魏大中报名状上批旨的例子。魏大中，浙江嘉善人，早年从高攀龙读书，属于东林党中的嫡派成员，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初官行人，天启初年提升为工科给事中。天启四年，他由工科迁吏科都给事中，照例在履任时要到鸿胪寺报名，并向皇帝进报名状。这是一种例行的报到手续，根据制度，皇帝是不能在报名状上批任何旨意的。但这一次魏忠贤由于受到别人挑唆，对魏大中颇怀成见，竟然在他的报名状上批旨说：“魏大中、傅樾互参事情，尚未明结，何得到任面恩？”这件事违背法度太厉害，引起了满朝的惊愕，甚至东林的反对派也认为这样做有所不宜。在朝臣的压力下，魏忠贤只好又收回成命，同意魏大中赴职。这一事例其实反映了魏忠贤对于政治法律常识的极度贫乏，说明象他这样一个人去充当最高政治代理人实在困难。但杨涟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他认为，这样随意破坏法度而后又轻率地改回，使“煌煌天语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关键还在魏忠贤盗用皇帝的名义上。魏忠贤不但打着皇帝的旗号推行自己的劣政，而且还要用自己的劣政反过来给皇帝的脸上抹黑，这才是忠臣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也是在天子的名义下，魏忠贤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在宫中，他敢把对自己不满的嫔妃置于死地；在宫外，他能对稍有触忤的人

残酷迫害。杨涟还在疏中列举了被魏忠贤排挤出朝堂的许多东林君子,包括刘一燝、周嘉谟、邹元标等 15 人。由于魏忠贤动用的是皇帝的名义,东林党人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他还倨傲僭越,在天子面前既没有人臣的礼貌,外出的时候又张扬炫耀,“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目”,俨然是天子巡狩的派头。杨涟在疏中列举了许多实例,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太阿倒持,主势益孤,及今不为早治,职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宫九嫔之安危何所托?贵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万一少有差池,职即欲以死报皇上,亦复何及?”

以上的这种耽心正是杨涟劾疏的中心思想。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方面,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分歧。杨涟给魏忠贤开列了二十四行大罪,却没有一条是同国家实际面临的严峻局面直接相关的。天启时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内忧外患已经发展到足以危及帝国安全的程度。但东林党的忠臣们对于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倒并不那么关心。他们认为在朝廷的悠悠万事中,最最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正遭人侵夺,皇帝的名誉正受人玷污,他们要为捍卫皇帝的利益而殊死奋斗。

杨涟的劾疏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三个月中,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蜂拥而至,联名的、单署的竟有七十余章。在各劾疏上署名的不仅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还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等朝廷重臣,以及地位较低的京堂、部属,连陪都南京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攻击魏忠贤的行列。有些衙门是首长带头集体署名,共同指责魏忠贤的大逆不道。八月,国子监(即国立中央大学)以署祭酒(代理校长)、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为首,包括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教职人员联名上

疏，对于魏忠贤作孽而由皇帝代为受过表示“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请求皇上“憬然悟，赫然怒，雷震之威，加以三尺”，对魏忠贤依法制裁。东林党人甚至几次打算在宫门外组织群臣进行静跪请愿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才没有实行。

天启四年夏秋之际，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斗争确实相当激烈，大有一举讨平之势，但效果却不是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在东林党人一番猛攻之后，魏忠贤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动摇，反而大大加强了。

二、汪文言一案

在东林党人同“邪党”的无数次倾轧斗争中，冲突最尖锐的莫过于万历到天启初年的若干次京察。明代考核官吏，“京官六年以己、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这种考核由吏部和都察院主持，一般称作京察。对于京官来说，京察是关系前途命运的大典，所以明代的党争从来以京察为关节点。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乙巳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杨时乔、左都御史温纯，起重要作用的官员有吏部考功郎中刘一琨和都察院河南道掌道御史吴达可。这些人或是东林骨干，或与东林人士交往密切。由这些人主持的京察当然难免一边倒，其结果是钱梦皋等一批浙党骨干遭到参处。但由于首辅沈一贯的内中活动，京察奏请处分的公文拖了几个月都没有批复下来。吏部

一再催促，最终却还是由皇帝出面和了稀泥，不了了之。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中的斗争更为激烈。这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丕扬、署理左都御史许宏纲，以及吏部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掌道御史汤兆京，都是东林干将，同时在内阁担任首辅的叶向高也是东林中人。也许是由于形势太有利，东林诸君有些头脑发热，他们把一切同自己立场不一致，关系不密切的小宗派都斥为“邪党”，借机大施挞伐，并且处分了一批对立派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宣党党魁汤宾尹。汤宾尹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折节下人，颇为自负，只因为与东林对立，就遭到查处。有人不平为他申诉，吏部尚书孙丕扬断然不允，而且说“老夫为今日去一严嵩，快哉！”其实汤宾尹的职位，不过如今日中央大学南京分校的一位校长，位才四品，明代祭酒一职照惯例又很难升迁，同一身当国的严嵩相比，相差得实在太远了。更没有道理的是，一些官声颇佳的人，只因为是汤宾尹的门生，竟也遭到株连处分。后来成为阉党重要骨干的王绍徽就是在这次京察中被驱逐的。

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干得痛快淋漓，却也遭到非常激烈的反抗。齐、楚、昆、宣诸党不甘于失败，于是联手向东林反攻。在京察后两三年中，他们运用各种手段，不但赶走了科道部属中的一大批东林党人，连叶向高、孙丕扬这样的阁部大臣也被一一驱除出朝堂。可以说，由于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行动过于激烈，反而导致了一场惨败。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的时候，已经是“邪党”们在最后巩固战果了。东林余绪后来称之为“其于正人君子，若风扫残云，雨摧坏块，靡有孑遗焉。”东林党人真正处于极端劣势中，正是在万历朝最后这几年。

直到万历帝死去，光宗和天启帝相继即位，东林党人才有了真

正的转机。依仗光宗的知遇和他们自己的努力，东林党人逐渐在朝中扎稳了根基。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又值京察大典，这一次又轮到东林党人算总账了。此次察典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张问达、左都御史赵南星都是东林健将，赵南星尤为著名。赵南星，北直高邑（今河北高邑）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当时人称他“公忠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节侠悲歌慷慨之风。”他以考功郎中的身分参加过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并且因为裁汰内阁的亲信太多而罢官。家居二十余年，他与顾宪成等人交往密切，名声也越来越大，与顾宪成及当时另一东林名人邹元标被合称为“三君”。光宗即位，这位老资格的东林政治家立即被启用，而且不到两年时间就由职位不高的太常寺少卿升至位列七卿的左都御史（不久后又升任吏部尚书）。他为人一向方刚严刻，做事从不通融。复官入都时，大理寺卿周应秋（后来为阉党“十狗”之首）郊迎结欢，赵南星却鄙夷地说：“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风至此乎？”大学士魏广微的父亲与赵南星是好友，魏广微因而数次拜访赵南星。赵南星却因魏广微品行不端而拒之不见。由这样的人主持京察，“邪党”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这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四品以上官员有23人，五品以下庶官315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把持朝局的齐党、楚党领袖人物，忝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位给事中。这四个人官职不高，能量极大，辛亥京察以后东林党人节节败退，多半就是败在这几个人的手里。但四人除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劣迹。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己见，并且特著文曰《四凶论》，把忝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

穷奇、桀骜、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忸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朝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党争中本属中立，但“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谮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这样，东林在政治上的胜利却反而增加了其敌对阵营的实力。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他们好象并没有想到，当他们正在出于一腔忠愤同魏忠贤斗争的时候，那些被纷纷赶出朝堂的新旧政敌也许会被迫站到魏忠贤一边去。事实确实如此，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受过重伤的徐大化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再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在后来名列逆案的阉党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很容易站在一条战线上。何况这些人本非气节之士，眼看朝局大变，跟上魏忠贤又能报仇，又能升官，何乐而不为呢？直到天启三年以前，簇拥在魏忠贤周围的还仅仅是一群大小太监及其亲随，而天启四年之后的魏忠贤集团却一下子冠盖如云，人材济济了。这种情况，主要是东林党人的为渊驱鱼政策造成的。

一大批反对派官僚投入到魏忠贤门下，应该是东林党人抗魏斗争最终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第一章中讲述过徐大化